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ISSN 1006-9550
CN 11-1343/F

世界经济与政治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

——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

为例 / 唐世平 王 凯 杨 珊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 / 吴心伯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

——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 / 张清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主办

2013 8
总第396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月刊)

2013 年第 8 期 (总第 396 期)

目 录

国际关系理论

4 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

——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 唐世平 王 凯 杨 珊

21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

王义桅 韩雪晴

40 国际安全合作中的潜规则：一项研究议程

林民旺

世界政治

54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

吴心伯

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 “系统效应”*

——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

唐世平 王 凯 杨 珊

【内容提要】 国家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系统内,因此,理解系统的特点对于国家战略的制定至关重要。罗伯特·杰维斯首先提出了“系统效应”的概念并指出它对战略行为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学界目前尚未提供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基本框架,从而导致对系统效应的考察和运用依然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为了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主张将系统效应分为四个维度:系统内的变化将会导致由“直接/间接、意图性/非意图性、立即/延迟和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构成的四组系统效应,而这四组效应又可以进一步组合成九种类型。以中苏同盟的破裂作为案例,作者证明了这次中苏之间的战略互动确实导致了多重系统效应,其中属于间接、非意图性、延迟或未发生的维度的效应在数量上更为可观。这些系统效应不仅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国际关系的走向。通过强调系统效应的重要性、提出并验证系统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及总结应用该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作者希望系统效应的思维能够受到学界和战略界的重视。

【关键词】 系统效应;中苏分裂;战略分析;中国对外战略;东亚安全

【作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王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3)08-0004-17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研究”(项目号:12BZZ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项目号:11JJD810017)的支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导言

系统广泛地存在于宏观/微观世界、无机/有机世界以及自然/社会世界之中,因此,各学科几乎都会讨论系统并发展关于系统的理论。^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对系统的探讨方兴未艾,并出现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复杂性转向”。^②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广泛引用各学科成果并批评本学科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是这一转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③

但是,国际关系学目前关于系统效应的讨论都没有给出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基本框架。比如,罗伯特·杰维斯只是强调了系统效应的普遍存在,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考察各种类型的系统效应,特别是战略行为的系统效应。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事实上,任何行为体,特别是国家,都处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因此,充分理解系统效应并自觉运用系统效应思维进行战略思考能够提高战略分析和决策的水平。以中苏同盟破裂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多维影响为例,本文展示了四个维度和九种类型的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超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并且进一步总结了应用系统效应的分析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笔者希冀这一分析框架在战略分析上的切实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的战略分析水平。

在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特别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之所以选取中苏同盟的破裂作为案例来阐述系统效应,是因为学界(历史/国际关系)已经全面和深入地研究过这一段历史,^④而且大部分人士相当当地了

① 本文沿用罗伯特·杰维斯对系统的定义,即任何“系统”必须具备两个特征:首先,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其次,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志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John Urry, “The Complexity Tur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2, No. 5, 2005, pp. 1-14.

③ 实际上,在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出版前的20年里,国际关系学科对系统的关注极少,这与世界系统论和结构现实主义过分强调“结构”而忽视系统内的其他部分的研究取向不无关系,比如,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对过分关注结构的批评,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5, 2013。

④ 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与美苏(以及周边国家)互动的专著和编著主要包括: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姜长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相关的论文可参见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63页;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3-40页;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51-67页;陶文钊:《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1-29页。

解和关心这一时期中苏之间以及中苏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所以本文可以在不带任何意识形态棱镜的情况下分析这段历史中行为体之间的真实互动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恰好为本文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透过这个案例,本文能够展示系统分析的强大力量。

第二,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系统效应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来指出其对行为体的战略评估和决策的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对中苏同盟破裂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某个特定的战略行为体(即中国)展开。这就意味着,本文强调中国放弃中苏同盟的战略决策会通过某些系统效应再次影响中国以后的战略行为和国际格局,并有意识地忽略了对此影响程度较低的其他系统效应。

第三,由于接触一手资料的困难性、决策者隐瞒战略意图以及在事后合理化战略行为的倾向,所以在下文中所提到的由战略行为导致的四组效应中,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明确区分是最为困难的。为了尽可能地在避免谬误的同时保持本文的完整性,本文只能力求通过合理的逻辑演绎和接触更多史料的方法来判定战略行为体(中国)的意图。

本文按以下几个部分展开:首先,指出既有讨论的不足,进而对系统效应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义和分类。其次,以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例,证明多重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影响力。再次,总结应用系统效应的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最后,强调精细分析系统效应的意义。

二 如何理解系统效应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系统效应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又常被忽视的部分,并且任何系统中的行为都会导致直接/间接、立即/延迟和意图性/非意图性三组效应。^①可是,杰维斯混淆了前两组效应,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本文认为,虽然直接/间接和立即/延迟这两组效应存在含义上的重叠,但是对它们进行必要的区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系统效应。此外,杰维斯没有注意到对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的区分同样体现了系统效应的一个维度,而未发生的效应只能通过反事实思考(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来考察。更重要的是,目前关于系统效应的讨论都没有给出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基本框架。

为了更为完善地考察系统效应,在此有必要先更加精确地定义这四组效应。

第一,对直接/间接效应的区分主要反映了影响的传递性。直接效应指的是由某项战略直接导致的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间接效应则反

^①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33-62页。另外,本文也想强调,因为系统内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是系统效应,试图去精确地定义系统效应并无太大意义。

映了因上述变化的产生而进一步导致的行为体之间后续的互动结果。

第二,对立即/延迟效应的区分通常依据时间维度。行为的某些效应也许很快就会显现,但是它的另一些效应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比如,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选择某个具体的专业,这一行为的立即效应之一是他将接触到这个专业的知识,而专业教育对于该学生职业发展影响的体现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区分需依据影响与预期相符合的程度。由于不同行为体对行为将在何时以及何处产生效果的预期不同,因此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区分往往需要研究者考虑行为体的这些不同预期。意图性效应指的是某种行为造成的影响与行为体的预期相符,非意图性效应则包括预期之外的收获、预期之外的损失以及与预期相反的结果这三种可能的影响。

第四,对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的区分同样体现了系统效应。实际上,上述前三组效应都属于发生了的效应,即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考察某一事实的影响。未发生的效应则体现了因某一历史事实(如某种战略行为)的发生而被阻止的其他可能事件。对未发生的效应的考察(主要使用逻辑和证据进行反事实思考)能进一步通过展现历史进程其他可能性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另一个维度的系统效应。

因此,系统效应可以细化为上述四组不同但又在含义上存在重叠的类别。通过将前三组发生了的效应组合成一个“2·2·2”的表格,我们可以得到八类细化后的系统效应(如表1所示),对它们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随后分析那些未发生的系统效应。

以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例,它对中国的对外战略造成了八类发生了的系统效应和另一类未发生的系统效应。下文首先将依次分析这八类发生了的效应,随后会运用反事实思考来考察那些未发生的效应。

三 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系统效应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具体并相对详细地讨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系统效应,特别是中苏同盟破裂对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本文将中苏同盟破裂的具体时间界定在1959年年底,因为在这一年前后中苏在一系列国内、双边和国际事件上的冲突将两国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彻底公开化,维系中苏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不复存在。^①虽然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些

^① 关于学界对中苏联盟破裂的时间节点的相关讨论,可参见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讨论》,第275-278、334、375页;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61页。

场合仍然会寻求修复双边关系,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恰恰反映了因同盟破裂而导致的两国间紧张(甚至敌对)关系。

表1 中苏同盟破裂的系统效应

		直接	间接
意图性	立即	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	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左”倾
	延迟	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推动了中国“革命外交”
非意图性	立即	1. 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程度陡增 2. 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3. 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1. 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 2. 推动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3. 推动印度对华军事冒险政策的制定
	延迟	导致中美之间相互认知的改变	1. 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接触与缓和 2. 为改革开放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减弱苏东剧变对中国的影响 3. 导致中日因快速建交的需要而搁置双边问题 4. 造成台湾地区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 5. 支撑了越南统一后的扩张野心,进一步恶化了中越和中苏关系 6. 维护了朝鲜的稳定,并导致了朝鲜的相对孤立

(一) 直接、立即且意图性的效应:中国获得更多的自主性

对中国来说,中苏同盟破裂造成的最直接、立即和意图性的效应就是获得了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自主性,从而使得中国领导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志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内外)战略。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牛军认为,“(‘中间地带’理论)它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革命运动在战后东亚格局中将独立发展的趋势,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不会再受任何大国操纵的基本趋势”。^①按照牛军的逻辑,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必然包含了“一些无奈”。这些“无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迅速涌上前台,中苏间长期存在的“控制”与“自主性”之争最终导致了中苏同盟的分裂,通过放弃中苏同盟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随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以及世界的格局。

(二) 直接、延迟且意图性的效应: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对于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领导人而言,与苏联划清界限不仅可以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第279页。

给中国带来急需的“自主性”,而且能够以延迟的方式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即无论他国是否乐意见到,中国已决心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虽然鲜明的自我定位既可能带来朋友也会招致敌人,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敢于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他们认为影响世界的对华认知是塑造一个理想世界的第一步,而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而言,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急躁和好战情绪”被认为可能“被反对派利用,从而导致走向缓和的世界局势被重新拉回到冷战的轨道”。^①同一时期,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同盟分裂的主流看法是“虽然中苏同盟发生了分裂,但是中国和苏联对西方世界的敌对态度是一致的,而且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②然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者来说,即使中苏同盟分裂会削弱革命的力量,一个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强大中国无疑也会被视为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福音。

通过改变自身,中国领导人确实做到了“意图性”地影响世界的认知。但是,一旦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意图性效应并没有完全按照决策者的战略构想带来令人满意的战略效果。

(三) 直接、立即且非意图性的效应

1. 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程度陡增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在谋求扩大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会考虑这种自主战略将导致多大程度的负面效果,因此他们尽力扩大收益(自主性),并力图减少损失(如可能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中国领导人毕竟无法完全预期苏联的战略回应和中苏(以及系统中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互动的前景。对于中国来说,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主要来自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回应,如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社会中公然贬低并斥责中国、制造边境摩擦以及不断加强中苏边境的苏联军事力量等。苏联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可能回应的预期,至此,中国同时面临来自诸多行为体(比如美国、苏联、印度)的安全威胁,而这种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将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中国以后的对外战略。

2. 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与苏联划清界限来获得国家的自主性并且力图在国际共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并不愿意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自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于未来国际共运方向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已经固化,但是在1959年年底到1961年年末,中国和苏联都仍然把缓和中苏关系和

① 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讨论》,第271-272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270-278、310页。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①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都试图利用不同的场合来说服对方。毛泽东相信,中共可以通过有限制的斗争手段来影响苏共,从而达到帮助赫鲁晓夫转变态度的目的,但是这种以斗争促团结的方式最终没能如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起到教育苏联的效果,反而促进了国际共运中“左派”和“右派”分野的形成,并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既成事实。

3. 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对苏联而言,中苏同盟破裂削弱了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进一步导致苏联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的其他战略行为体。中苏从“朋友”到“竞争者”再到“敌人”的身份转变迅速增大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压力,削弱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为了制衡中国并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苏联积极在这一地区强化盟友关系,苏联的这一战略意图随后导致了中苏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

(四) 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效应:导致中美之间相互认知的改变

中苏同盟的破裂并没有立即导致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这种变化是以一种延迟的形式产生于中苏由分裂走向兵戎相见的互动过程中。

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一直都是难以把握的,中美之间的历史纠葛、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战略对峙导致即使在中苏争斗愈演愈烈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依然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② 然而,当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后,中苏同盟分裂的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效应终于体现了出来。1969年年初,毛泽东让陈毅等老帅们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的举动既是为了了解党内战略人士对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看法,也是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的党内支持以期逐渐调整对美国 and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战略。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认知的改变与中苏同盟分裂以及随后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安全威胁休戚相关。

对于美国而言,中苏从同盟分裂到公开对抗的过程同样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影响了其对华认知。冷战爆发后,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大致有两大派别:一派更加拘泥于僵硬的意识形态分野,另一派则强调对社会主义阵营“分而治之”的可能性。中苏同盟的破裂以及随后的兵戎相见有力地挑战了前一派战略家的世界观和战略逻辑,渐渐增大了美国外交圈内后一派精英的话语权。当然,中美之间的接近与缓和绝不仅仅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但是,中苏同盟破裂和交恶的过程使得“共产主义运动是铁板一块”这样的判定不攻自破,迫使美国战略界不能继续完全使用“意识形态因素”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

^① 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讨论》,第280、328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501页。

辩解,进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更加有可能发生。就这一点来说,中苏同盟破裂以及后来的公开对抗,对美国精英战略思想的影响是无法被其他的可能事件所替代的。

(五) 间接、立即且意图性的效应: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左”倾

中苏同盟从出现间隙到最终分裂的过程导致中国领导人不断获取并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自主性”,而中国对“自主性”的追求最终在国际压力、国内政治变化和经济衰退的互动中演变成中国领导人对本国“左”倾模式的盲目崇拜,它体现在领导人对于时代特征、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固化。

进一步来看,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中国领导人必须合理地国际和国内社会解释为什么“苏联老大哥”现在转变成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阻碍和威胁、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模式代表了正统的马列主义道路并且值得效仿,中国外交战略中“左”的倾向正是在这样一种朴素的逻辑中被不断强化。中苏同盟分裂以及随后的中苏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并且一步步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①在对外战略领域,这种“左”的倾向逐渐将“和平共处”的原则边缘化,进而影响到具体政策的制定。

(六) 间接、延迟且意图性的效应:推动了中国“革命外交”

中苏同盟破裂带来的中国“自主性”的提升以及“左”的意识形态在对外战略领域的泛滥共同促进了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走向极端(推动“世界革命”)。“革命外交”要求中国领导人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五种表现形式:(1)通过国内宣传和动员为“革命外交”提供支持;(2)利用驻外机构和人员宣传革命思想;(3)通过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甚至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革命;(4)派出(准)战斗人员直接参与国外的革命运动;(5)直接针对“美帝、苏修和反对派”进行军事斗争。^②

“革命外交”的实施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属于意图性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例如促进了国外“毛派”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繁荣及其在当代的延续。但是,“革命外交”导致的其他诸多后果则更多属于超出政策制定者预期的非意图性效应,例如损害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

(七) 间接、立即且非意图性的效应

1. 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

虽然中国领导人长期抱有在第三世界交朋友战略意图,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

^①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② 关于“革命外交”的详细论述,参见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和实践》,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62-74页。

中苏同盟破裂给中国带来的非意图性效应(即战略孤立局面带来的巨大压力)间接并立即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至中苏论战最激烈的1964年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密集出访了27个亚非国家,出访时间分别是在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1960年年初以及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周总理这三次出访的时机,则不难发现这三次大规模出访都发生在标志着中苏双边矛盾显著升级的事件之后,即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1959年戴维营会议后的美苏缓和态势和中印边界冲突以及1963年开始的中苏论战。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整体上确实有助于打破中苏分裂后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这种和平的交朋友政策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为应对战略孤立局面而采取的一种权宜和无奈之举,它与“革命外交”政策在手段和目标上的差异正反映了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巨大影响。

2. 推动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推动世界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所希望达成的对外战略目标之一,但是直接在家门口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显然并不符合他们的初衷。本文认为中苏同盟破裂间接并立即地推动了越战的升级,而这场发生在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战争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则是非意图性的。^②

中苏同盟的破裂通过影响越战的两个主要行为体(中国和美国)进而促进了越战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的升级。首先,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分裂导致中国必须全力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造成中国对越政策的战略回旋余地极小,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1)中国的自我定位、“左”倾的对外战略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事实导致中国放弃支持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内外)声誉损失将是极其高昂的;(2)战略孤立局面造成中国害怕越南彻底变成美国人或者是苏联人的地盘,因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其次,虽然美国卷入越南问题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其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需要以及对所谓的“多米诺效应”的恐惧,但是美国之所以敢于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再次在中国家门口挑起并主动升级冲突,则与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危机)对中国行为的限制作用不无关系。

简而言之,一方面,中苏分裂造成中国必须支持越南革命;而另一方面,美国仅仅从中苏分裂的事实中注意到了中国“战略能力”的降低,却忽视了中国“革命决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资料:《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2159_611322/19010.shtml。

^② 关于中苏分裂如何影响了中美对越战略的制定,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225-232、251-264页。

在中美双方的互动下,越战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升级。

3. 推动了印度对华军事冒险政策的制定并加剧了中苏冲突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同样受到了中苏分裂的促进作用。这场中印较量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20世纪50年代晚期尼赫鲁政府的军事冒险政策(集中体现为1961年印度制定的“前进政策”)。进一步分析,印度之所以敢于制定这种进攻性的政策,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印之间存在未解决的地缘政治矛盾,这对寻求大国地位的印度来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印度认为中苏分裂所导致的美苏对华认知变化和中国的战略孤立局面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印度处理得当,那么印度的反华政策将会同时获得美苏的支持。最后,印度高估了中国在“大跃进”后面临的国内困难。

虽然印度挑起了冲突,但是中国却主导了这场战争的形式(快速的歼灭战)和结果(中方胜利后单方面后撤),而中国选择这种令世界吃惊的方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因则可以部分归结为中国自主性的提升、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和“左”的对外战略方针。此外,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中苏分裂推动的中印边界冲突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以及中美之间的冲突,而且塑造了冷战期间南亚的战略格局(即印巴敌对、中巴接近、美苏竞相拉拢印度)。^①

(八) 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效应

战略行为发生在一个包含各类行为体的国际系统而非真空环境内,它必然招致其他行为体的战略回应,这种“行为-回应”互动链条的延伸导致国际体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互动行为和结果。对于初始的战略行为来说,这些体现着系统效应的互动行为和结果将不断贴近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维度,因此,这类效应是数量最为可观的一类发生了的效应。

1. 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缓和

中苏同盟破裂以及随后的兵戎相见以一种延迟的形式促使中美双方考虑改善双边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接触和缓和。但是,中苏分裂并非是导致中美建交的充分条件,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的“破冰”却不能保障中美克服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所有障碍,苏联在全球范围的进攻性战略才是推进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通过积极促成美苏缓和来消减中美关系破冰带来的战略压力,^②而美苏缓和的结果反过来造成美

^①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参见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载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56页。

^② 例如,1971年3月美苏在维也纳的第四次谈判面临重大分歧:美国希望同时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而苏联只愿讨论进攻性武器的限制问题。然而,中美接近的信息立刻影响了苏联的战略判断:在获悉基辛格访华和中美开展“乒乓外交”的消息后,苏联的态度在数月后就发生变化,同意同时进行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谈判。参见陶文钊:《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1-29页。

国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降低。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中美两国都认为苏联的军备建设以及它在全世界发动的代理人战争(在中南半岛、中亚和非等地)对自己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步骤才得以迅速加快。

中美关系破冰随后打开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交流的大门,中日(1972年)、中(1972年)、中德(1972年)的正式建交以及1973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首位访的西欧国家元首)的中国之行无疑极大地受到了中美接近的直接影响。

2.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苏同盟破裂十余年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本文认为,中苏同盟的破裂以一种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来说,中苏同盟破裂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三大历史“遗产”,即自主性、战略孤立和“左”倾意识形态,而这三大遗产通过不同的逻辑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中苏分裂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需的能力——国家的自主性。其次,为了扭转恶化的战略孤立局面而与西方的“破冰”战略使得中国得以再次“睁眼看世界”,为改革开放“打好了前哨”。最后,“左”倾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遵循着原因-后果反思的路径。从一定程度上说,“左”倾的失败产生了改革开放得以生存的土壤。

3. 导致中日因快速建交的需要而搁置双边问题

1972年中日迅速建交导致的双边遗留问题在当代的发酵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效应。20世纪70年代初,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摆脱战略孤立局面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因此快速建立并稳定中日双边外交关系是中国政府的头等议题,而战争赔偿问题、中日(民间)和解与钓鱼岛问题等议题就不得不被置于“搁置”的状态。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之间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再次相互纠缠和发酵,制约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并恶化了东亚的安全困境。

4. 造成台湾地区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

中苏同盟的破裂虽然造成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并没有给台湾地区带来相对大陆的战略优势:首先,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嘲弄了7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中苏同盟破裂推动的中美破冰和它的“多米诺效应”导致“国民党政权”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被断交、失去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其次,中国随后的改革开放进一步不可逆转地扩大了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战略优势。

5. 支撑了越南统一后的扩张野心

一方面,当中美在支持各自盟友和避免越战无限升级的矛盾中走向和解后,越南劳动党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为中南半岛上最富斗争经验和能力的行为体,并且日益不满曾

盟的盟友——中国；另一方面，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调整了“三和政策”，开始积极介入越南局势，谋求提升因中苏同盟破裂而在亚洲受到削弱的战略地位。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在全球的进攻态势明显以及中美双边关系得到提升的情况下，越南选择倒向苏联以支撑其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苏联的大批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导致越南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和意愿得到增强，并进一步导致中越和中苏矛盾显著升级。

6. 维护了朝鲜的稳定，并导致了朝鲜的相对孤立

朝鲜之所以能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保持稳定（既未再次受到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干涉，也未受到社会主义大国的过度干预）则与中苏同盟破裂导致的多种系统效应不无关系：首先，中苏同盟分裂导致朝鲜获得了不对称的战略地位（可以在中苏之间谋求平衡）。其次，由中苏分裂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使朝鲜进一步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红利——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中国有强大的动机来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最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得中国有能力为朝鲜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安全保障。虽然中苏同盟破裂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稳定，但是它的其他系统效应（促进中国与美日韩的交往）却造成了朝鲜的相对孤立。

（九）未发生的效应：历史的其他可能走向

使用反事实思考得出的未发生的效应可以揭示历史的其他可能走向。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逻辑路径和证据能够得出不同的未发生的效应，但是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中苏分裂导致的若干相对重要的未发生的效应。笔者认为，如果中苏同盟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或者说破裂的时间大大推迟，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将扩大、中西的隔离和对抗期将延长，从而会导致中国某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被推迟。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假定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必然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苏东剧变（亦即苏东剧变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外生于中苏关系），则中国将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由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其后果将难以想象。

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将扩大

如上文所述，中苏同盟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然而，如果中苏同盟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或者说破裂的时间大大推迟，那么随着中苏整体实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幅提升（如果中苏能够避免分裂，则苏联将继续支援中国的建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危机（如美国深陷越南战场、石油危机等），则中苏的长期合作将有能力并且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

2. 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离和对抗期延长

如果中苏同盟没有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破裂,则中苏双方仍将在相互妥协中保持联盟至少形式上的完整性,但是双方关于国家自主性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论势必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主性和战略孤立状态必然同时降低,则中国将不能(自主性低)或者不愿(缺乏战略孤立带来的接触动机)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此外,如果中苏同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则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立将会持续固化,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很难发生变化,其接触中国的动机必然减弱。综合上述逻辑,除非中苏同盟在晚于现实的某个时间产生某种严重的裂痕或者苏联(也可能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类似“新思维”的剧变,否则中国很难在 70 年代初期就能与西方“破冰”,而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离和对抗期将会延长。相应地,中国某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也将会被推迟。

3. 中国受苏东剧变的冲击力将增大

现实中的苏东剧变导致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阵营崩溃造成的巨大冲击,民主转型并没有立即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在较早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发起的、更加主动和可控的改革过程,因此,在已经坚定不移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十年之后,中国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苏东剧变的巨大压力。但是,如果苏东剧变发生时中苏依然保持了稳固的同盟关系(假设中苏同盟的稳固并不能阻止苏联发生某种形式的剧变),那么在对西方制度缺乏了解 and 缺少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由某种形式的苏东剧变导致的巨大冲击力,中国当今的走向将难以预料。

四 应用系统效应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

上文以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例,证明了多种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但是,系统效应的存在并不会导致人类的行为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直截了当的方式达到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相反,通过更为完善地评估战略行为可能会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可以更为精准地设定达成战略目标的路径或者尽快调整难以达成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考察战略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系统效应。

(一) 重视多种系统效应

上文已经展示了中苏同盟的分裂会导致八种发生了的和另一种未发生的系统效应。随着这些效应越来越贴近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维度,它们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最终参与塑造了当代东亚(甚至世界)的格局。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战

略的评估和决策阶段应特别重视分析由潜在的战略行为所引发的系统效应,特别是那些不断贴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维度的效应。

为了全面地考察系统效应,我们可以先从绘制战略行为(或者战略结果)的影响图入手(参见图1)。在这个初步的评估图中,实线箭头表示确定的影响,虚线结构表示不确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前者几乎是无条件的:只要中苏联盟破裂,就一定会产生(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后者是有条件的:中苏同盟的破裂可能只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比如中美和解)。但是,一旦某些有条件的结果成立,它又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结果必然发生(比如,在中美和解后,中日交往和中韩交往的增强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朝鲜的相对孤立)。通过绘制这样的影响图,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各种可能的影响,更为方便地推敲某个具体的影响到底属于哪一类系统效应。随后对系统效应的考察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完善初步的影响图。

(二) 考察系统效应应从直接效应开始

分析某一具体战略可能导致的系统效应应从该战略对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国内外战略环境造成的直接效应出发(即首先评估表1中的“直接效应”这一列),无论这种效应包含立即/延期还是意图性/非意图性的维度。

考察战略行为的直接效应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各种间接效应的基础。比如,中苏联盟破裂导致的直接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六点:(1)中国获得更多自主性;(2)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认知;(3)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程度陡增;(4)社会主义阵营分裂;(5)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6)导致中美之间相互认知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较准确地考察这些直接效应,那么我们就有信心预测相关行为体未来的战略行为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因此,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多种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应遵循直接效应到间接效应逻辑链条。

(三) 评估各种意图性/非意图性和立即/延期的直接效应

在评估各种类型的直接效应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和立即/延期效应这两个维度。意图性的直接效应往往集中体现了某项战略的主要目标,无论这种效应是立即还是延迟的(两者的区别仅反映在达成战略目标所需的时间维度上)。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确定某项战略的主要目标以及实现各项目标所需的时间是评估战略的第一步。

在完成评估的第一步后,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某项战略可能直接导致的立即、非意图性效应或延迟、非意图性效应。在分析这些效应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考察这项战略会在一个长时间内影响哪些相关行为体,是否会导致这些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战略环境发生某些变化。再次以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例,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做出放弃中苏同盟的决策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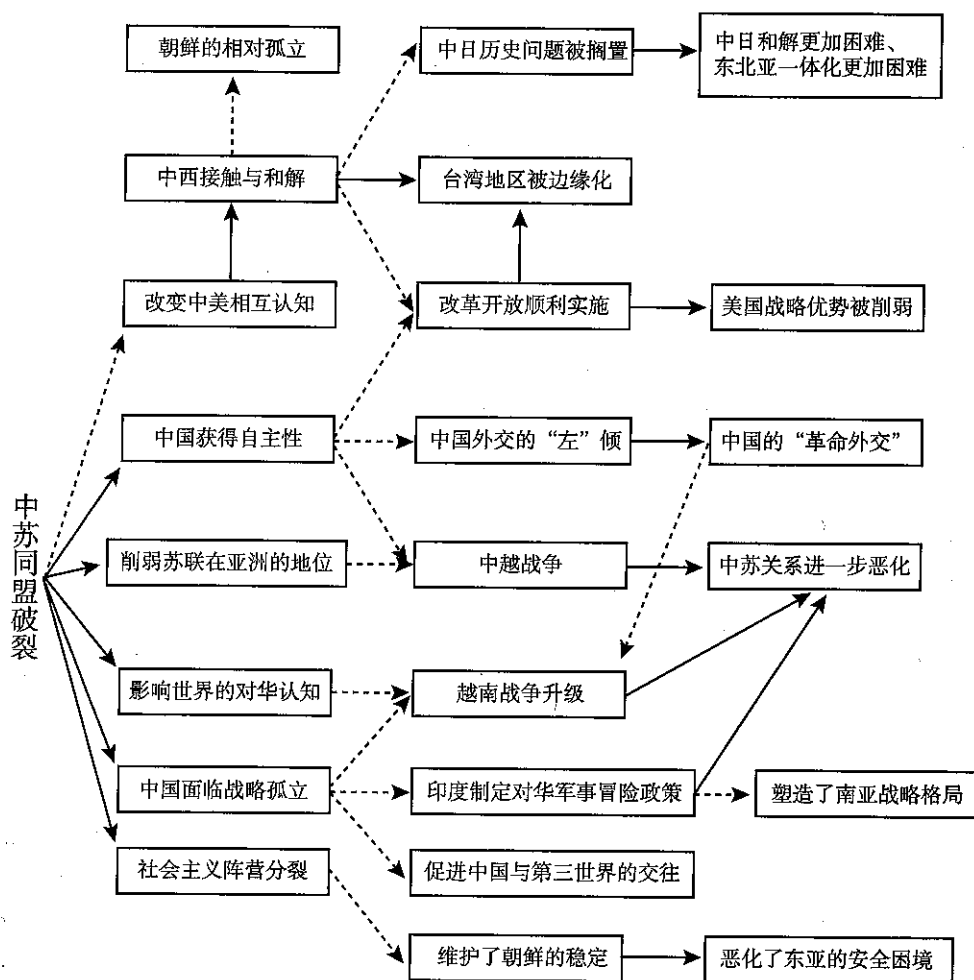


图1 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图

能够全面评估在中苏分裂的短期内“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战略环境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国际共运的前景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从长期来看“是否会影响各主要大国的战略判断”，那么中国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这些可能的非意图性效应来调整战略路径和战略目标，甚至会因为达成目标的成本太大而暂时放弃战略行为（即更加主动地寻求避免中苏分裂）。

（四）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考察各种间接效应

在一个系统中，行为体不可能指望己方的行为不对系统中的行为体或系统的环境产生任何影响，每项战略行为带来的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环境的变化必将造成这些行为体考虑采取相应的应对战略（即系统的反馈作用），从而进一步导致系统中

各个行为体之间后续的战略互动。因此,为了尽可能准确而全面地预测这些互动,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诸多可能的间接效应。而且,有一点必须牢记:间接效应通常比直接效应更加广泛,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首先,有些间接效应可以较为方便地从直接效应推测出来。例如,当中苏分裂导致中国的孤立局面陡增时,与利害关系较少的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就是一种非常可能被执行的战略。

其次,对另一些间接效应的评估必须将战略的直接效应与其他外生于该战略的因素(如既有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等)联系起来考察。例如,当中国被孤立且被视为“危险”的国家时,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印度将有机会和动机采取冒险的对华政策。

最后,更多的间接效应来源于外生因素、直接效应和已发生的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例如,如果苏联的扩张意图明显、中国长期受困于战略孤立并且中苏矛盾加剧等条件会同时存在,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考虑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近的可能性。

(五)使用反事实思考来分析未发生的效应

政策制定者除了需要评估可能由某项战略导致的上述三个维度的系统效应,还必须使用反事实思考来分析战略行为可能造成的未发生的效应。虽然使用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来评估尚未被执行战略与分析历史上已发生的战略之间存在表面上的不同,但是考察这一维度的系统效应仍然可以有助于完善战略评估,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战略行为将会通过何种路径带来什么,而且应该清楚它会怎样导致我们失去什么。

对于任何一项处于评估阶段的战略计划来说,虽然该项战略中所描绘的、达到战略目标的路径实际上都处于未实现的状态,但是这些路径实际上体现了政策制定者预期中的发生了的效应。相应地,该项战略的未发生的效应相当于使用反事实思考来预测该战略的实施可能会阻止系统中的哪些变化(即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在实际分析未发生的效应时,除了首先提出反事实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利用在考察诸多发生了的效应时使用的逻辑和证据,因此,首先分析发生了的效应,再分析未发生的效应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上文在分析了中苏分裂导致的诸多发生了的效应后,就可以较为有效地推测出中苏分裂导致的某些未发生的效应(即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或多种与现实大相径庭的可能走向)。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要通过战略设计来建立一条最为有利的、通向未来的路径,那么评估各项战略可能导致的未发生的效应则是必须的步骤之一。

五 结论

本文展现了系统效应在国际安全战略中的存在及其巨大影响力。在国际系统内,每

一项安全战略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战略发起者的后续行为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以中国放弃中苏同盟的战略行为为例,它不仅以各种方式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战略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南亚甚至世界的走向。通过进一步将系统效应细化为四个维度和九种类型,本文提供了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框架,因而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文强调,习惯性地采用线性思维方式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系统和更广范围的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系统的挑战,我们必须采用系统效应的(乃至进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有应用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并积极发掘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以系统中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机制(如路径依赖、多米诺效应、螺旋效应以及反馈等)。

具体到战略的层面,本文对系统效应的讨论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制定。首先,这一分析有助于优化己方的战略评估。通过更为精细地评估战略行为可能会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可以更为精准地设定达成战略目标的路径或者尽快调整难以达成的战略目标。其次,对系统效应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对手的战略。通过评估对手的战略可能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我们可以寻找并利用该战略的不足和疏漏,从而方便我们“对症下药”。

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来说,系统效应给予我们的提醒是非常有用的。首先,系统效应的存在要求我们统筹协调各项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外交中存在大量的战略思路 and 概念,例如,按照外交对象划分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按照外交手段划分的政党、文化、经济和军事外交以及因具体议题而异的领域外交(能源、人权、环境和网络等),这些不同层次的战略的实施会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系统效应,因而极有可能影响各自战略目标的达成。其次,相比其他影响力有限的国家,中国制定的安全战略必将对世界产生更为深远的系统效应,因此,抱着对中国和世界负责的态度,中国更应该关注国家战略的系统效应。最后,系统效应的存在要求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评价历史,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本文的案例中:中苏同盟的破裂在短期内既增强了中国的自主性又造成了中国的战略孤立,但是从长远来看却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地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虽然这其中的许多系统效应可能都不是中国领导人所能预想到的,更谈不上是设计好的。

本文给出了应用系统效应进行战略评估和决策的分析框架。但是,具体的战略评估需要战略分析人士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地运用这一框架。

[收稿日期:2013-06-30]

[修回日期:2013-07-20]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